

严如煜“汉江南北图”绘制时间考论*

刘 赞

提 要：严如煜绘有一套“汉江南北图”，包括《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和《汉江以南三省边舆图》两图。通过图上县级治所的迁移情况，可大致判断“汉江南北图”绘制于嘉庆十三年至十八年。但通过图上若干佐贰、营汛驻地的考证，笔者发现存在与嘉庆十三年至十八年的绘制时间相矛盾的情况。这种矛盾情况的产生，可能不是客观资料的限制，而是严如煜的有意之举。这种现象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舆图所承载地理信息的复杂性”，进而认识到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传统中应不包含当今地图对于地理信息表现的“现时性”“共时性”特征。中国古代地图中可能会出现不同时代的信息共存于一图的情况。

关键词：严如煜 《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 《汉江以南三省边舆图》 绘制时间

地图绘制时间是古旧地图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历来为学者重视。20世纪90年代，李孝聪提出过4种判识依据：行政建置变化、避讳制度、历史地理知识、入藏日期。^①其方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为之后的研究者广泛应用。近来，学界对于地图绘制时间的考证判断，郑永华总结为“断限逼近法”^②。随着西方地图史研究的影响^③以及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进入地图史研究领域，古旧地图的研究也从过去的以实证研究为主转向多元化的理解与诠释。就地图的时间判别而言，受近现代地图编绘影响而产生的“时间一致性”的认识日渐受到质疑。成一农、孙靖国等学者开始认识到古旧地图承载地理信息的复杂性，进而反思中国传统地图绘制年代的判识问题。^④

严如煜绘有《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和《汉江以南三省边舆图》（以下分别简称《汉北图》和《汉南图》）。文献在记载这两图时称为“汉江南北、三省山内各图”^⑤，“汉江南北及三省山内各图”^⑥，“汉江南北二地图”^⑦。总而言之，这两幅图应为一套地图，可统称为“汉江南北图”。目前学界对于《汉北图》的绘制时间已有较多论述，可以此指代“汉江南北图”的绘制时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陕西古旧地图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VJXT003）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续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41—43页。

② 郑永华：《两张英藏晚清广州洪兵舆图成图时间再考——兼及舆图成图时间考证的“断限逼近法”》，《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2期。

③ 潘晟归纳了西方地图史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向（参见潘晟：《西方地图史研究：收藏兴趣、后现代转向、多样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1辑），我国近十几年在地图史研究的转型也可以置于西方地图史研究转向的大背景下来理解。

④ 参见成一农：《浅谈中国传统舆图绘制年代的判定以及伪本的鉴别》，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文津学志》（第5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105—113页；孙靖国：《〈江防海防图〉再释——兼论中国传统舆图所承载地理信息的复杂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⑤ 《清史稿》卷361《严如煜传》，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1393页。

⑥ 《清史列传》卷75《严如煜传》，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本，第6235页。

⑦ 魏源：《陕西按察使赠布政使严公神道碑铭》，严如煜纂修，张鹏翮补修，郭鹏点校：《三省边防备览点校》，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31页。

间。李孝聪、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从行政建置以及避讳制度的角度出发,考证其绘制时间应在嘉庆年间。^① 林天人结合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汉南图》认为此图应为道光二年(1822)刊行《三省边防备览》同一时段的作品。^② 冯岁平结合严如煜仕宦情况以及地图绘制方法的变化,认为此图绘制于嘉庆十三年(1808)至嘉庆十六年五月之间。总体而言,前人研究或是通过图上个别地理信息的建置时间,或是结合地图绘制的背景信息确定绘制时间,缺乏对于图上绘制的地理信息整体的考辨。“汉江南北图”的绘制时间仍存在进一步探索的余地。本文即以此出发,通过对图上地理信息尽可能的全面考察^③,探究地图绘制时间,进而发现图上存在时间矛盾的地理信息,以此反思中国传统地图地理信息的时间表达情况。

一 “汉江南北图”的版本选取

“汉江南北图”目前有多个版本。概而言之,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汉北图》刻本^④,国家图书馆藏《汉北图》《汉南图》刻本^⑤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汉北图》《汉南图》绘本。^⑥ 国家图书馆所藏“汉江南北图”尚未公开,本文难以对其进行研究。美国藏《汉北图》上有“楚南严如煜谨识、蜀北郑炳然谨绘”的注记,因此其可能为严如煜原本。此即本文选用的《汉北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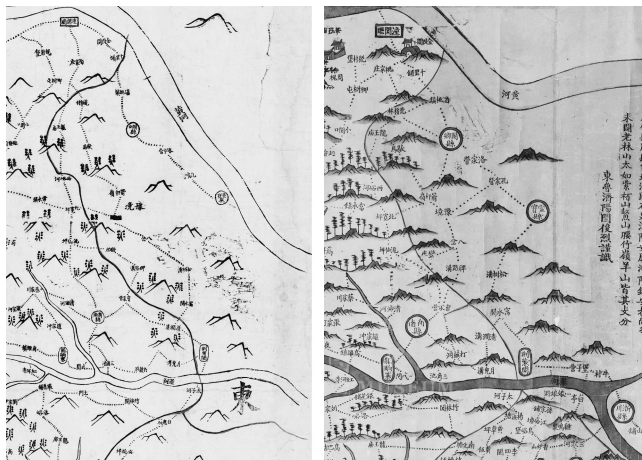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左)、台北(右)藏《汉北图》边缘地区比较(河南部分)

- ① 李孝聪认为在1800—1820年间,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认为在1800—1821年间,两者大体相同,可视为一论(参见李孝聪编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50页;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 ② 参见林天人编撰,张敏译:《皇舆搜览——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清舆图》,台北“中央研究院”数位文化中心,2013年,第71—72页。
- ③ 由于《汉北图》《汉南图》两图在汉江南北两岸地区有重叠部分,若所绘地理信息冲突则以美国藏《汉北图》为主。
- ④ 参见李孝聪编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第50页;林天人编撰,张敏译:《皇舆搜览——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清舆图》,第106页。
- ⑤ 参见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第59页。
- ⑥ 参见林天人主编:《河岳海疆——院藏古舆图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第56—59、70—72页。

《汉南图》原本暂无从得见,只能借助现存摹绘本推测原图情况。台北藏《汉北图》乃阎俊烈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至道光二年的摹绘本。^①结合冯岁平对美国 and 台北藏《汉北图》的比较^②,可以认识到三点:第一,台北图反映的区域比美国图大,体现在台北图边缘增补了美国图没有的地理信息;第二,台北图和美国图在地图中央部分特殊符号地名^③的表示上是相同的(台北图仅有少数错字);第三,无论是台北图还是美国图,地图边缘部分地理信息皆存在程度不等的简化现象。因此,两图中大部分地理信息的绘制应是相同的,但要注意地图边缘地理信息的归属与简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可由台北藏《汉南图》推测严如煜原本《汉南图》上的地理信息绘制情况。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的严如煜“汉江南北图”主要是美国藏严如煜原本《汉北图》和台北藏阎俊烈摹绘本《汉南图》。严如煜原本《汉南图》的地理信息绘制情况由台北藏《汉南图》推测而来,主要关注地图中央部分特殊符号地名的地理信息。因此,本文对图上地理信息的考证主要涉及陕西省西安府的孝义厅和宁陕厅、汉中府(不包括宁羌州、略阳县)、兴安府,四川省绥定府、夔州府、保宁府(只包括通江县、南江县、巴州)、太平直隶厅,湖北省郢阳府(以上政区以嘉庆十三年为准)。地图边缘的政区暂不入考察之列。

二 政区治所迁移与“汉江南北图”的绘制时间

前人对“汉江南北图”的研究,通过地图的背景信息,可将绘制时间推定为嘉庆十三年至嘉庆十六年五月之间。这一判断的时间上限由严如煜上任汉中知府“才有可能开始准备绘制有关秦岭、巴山地区的地图”推测而来^④,但严如煜在成书于嘉庆十年(1805)至十二年的《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已绘有一幅《三省山内简明地图》^⑤,可知他在上任汉中之前已有关于三省山内地区的地图绘制。时间下限的依据是严如煜所编地图绘制方法的改变。嘉庆十六年,卢荫溥曾于使蜀返京途中于汉中府署小住,在此期间阅览严如煜所绘《三省边境山川道路图》,建议其使用更为明了的计里画方之法。^⑥在此之前,严如煜所编地图可能未使用计里画方,《汉北图》正符合这一特征。然而,严如煜所作《苗防备览》成书于嘉庆四年^⑦,该书所附地图无画方,但在其后却说明使用了计里画方之法。^⑧因此在见到卢荫溥之前,严如煜就已知晓计里画方之法。在其绘图实践中,使用的计里画方之法也未必以方格形式直接表现在图上。因此,这一绘制时间判断在论证上不能成立。

① 参见冯岁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汉江二图综论》,《安康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冯岁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小议》,《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② 参见冯岁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小议》,《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③ 此处所指的特殊符号地名是指外部有框线的地名,在图中主要指各级行政区划以及营汛、佐贰驻扎之地。

④ 参见冯岁平:《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述考》,《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⑤ 参见辛德勇:《〈三省山内道路考〉的发现及其价值》,沈乃文主编:《版本目录学研究》(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2页。

⑥ 参见严如煜:《叙》,严如煜主修,郭鹏校勘:《(嘉庆)汉中府志校勘》卷首,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⑦ 参见严如煜:《苗防备览引》,严如煜:《苗防备览》,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

⑧ 参见严如煜:《苗防备览》卷1《舆图》,严如煜撰,黄守红标点,朱树人校订:《严如煜集》,岳麓书社,2013年,第414页。

因此，仅从地图背景信息出发推定地图绘制时间的方法需要审慎使用。在缺乏足够有力的背景信息证据的情况下，“汉江南北图”绘制时间的判断仍要遵循李孝聪提出的方法。其中行政建置变化也应当包括政区治所的变动迁移情况。通过对“汉江南北图”上所选地理信息的梳理，可发现存在如下表 1 所示的治所迁移情况：

表 1 治所迁移情况表

序号	名称	迁移地点	迁移时间	迁回时间	图上表现
1	留坝厅	太平山	嘉庆十一年（1806）	/	不详
2	孝义厅	旧县关	嘉庆八年	/	图上已迁移
3	宁陕厅	新城	嘉庆十三年	嘉庆十八年	图上位于新城
4	平利县	白土关	嘉庆七年	/	图上已迁移，并绘有旧城
5	东乡县	大成寨	嘉庆二年	嘉庆十八年	图上位于大成寨 ^①
6	通江县	安辑寨	嘉庆二年	嘉庆十三年	图上已迁回
7	南江县	惠民寨	嘉庆二年	“旋迁”	图上已迁回
8	巴州	平梁城	嘉庆二年	嘉庆十年	图上已迁回

其中，除留坝厅厅城由于迁移距离较近，地图难以表示清楚之外，其他厅、州、县的治所迁移情况皆指向“汉江南北图”绘制于嘉庆十三（1808）至十八年。而宁陕厅治所迁移，尤与严如煜密切相关。

宁陕厅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新设之厅，初名为五郎厅，嘉庆五年（1800）改为宁陕厅。^②厅治旧无城垣，嘉庆三年，贼匪滋扰，通判左观澜劝厅民捐筑土堡^③，此为宁陕厅城垣之始筑，为旧城。嘉庆八年，同知张约建修宁陕镇城，为新城。^④嘉庆十一年七月，因军饷问题，宁陕镇新兵兵变，“毁厅署及城内民房一空，土堡坍塌”^⑤，宁陕厅旧城被毁。

宁陕兵变 3 个月即被镇压。但旧城已毁，同知等官员只得“暂寓焦家堡”^⑥。嘉庆十二年（1807），西安将军德楞泰等奏“陕西宁陕厅城不得地势，现又残毁，应择地移建”，嘉庆帝从

① 《汉南图》上绥定府的西南方向亦有“大成寨”，但可能是误注。东乡县大成寨位于绥定府北侧，图上东乡县城正位于绥定府北侧。此外，图上东乡县城位置与《三省边防备览》中已迁回的东乡县路程记载不合，又与县志中所记大成寨僻处县境西隅的记载相合。由此推测图上的东乡县城应位于大成寨。

② 参见林一铭修，胡官清、焦世官纂：道光《宁陕厅志》卷 1《沿革》，“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7 年，第 56 册，第 55 页。

③ 参见林一铭修，胡官清、焦世官纂：道光《宁陕厅志》卷 2《城郭》，“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 56 册，第 68 页。

④ 参见叶世倬：《新修宁陕厅城记》，林一铭修，胡官清、焦世官纂：道光《宁陕厅志》卷 4《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 56 册，第 92—93 页。

⑤ 林一铭修，胡官清、焦世官纂：道光《宁陕厅志》卷 2《城郭》，“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 56 册，第 68 页。

⑥ 林一铭修，胡官清、焦世官纂：道光《宁陕厅志》卷 2《城郭》，“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 56 册，第 68 页。

之。^① 嘉庆十三年, 宁陕厅同知“移驻宁陕营总兵署”^②, 以新城作为厅城。《新修宁陕厅城记》载: “于是移总兵官于汉中, 而以镇署为厅署, 且议修其城为厅城, 久不决。”^③ 虽宁陕厅同知已移驻新城, 但是尚未完全确定新厅治所在。在这种情况下, 宁陕厅贡生焦世彦因新城居民生活不便, 呈请迁回旧城。^④ 嘉庆十五年, 陕西巡抚董教增先后委派兴安知府叶世倬、汉中知府严如煜查勘宁陕移城之事。不同于叶世倬提议迁城于旧城北 140 里的洵阳坝^⑤, 严如煜撰《宁陕文员仍宜驻旧城论》主张仍将厅治迁回旧城。最终清廷确定仍以老城作为厅治。《清实录》载:

陕省宁陕厅新旧二城, 前因旧城被毁, 议将新城培筑, 作为厅治。嗣该处士民以新城取水较远, 旧城井泉甘美, 居民稠密, 呈请仍就旧城基址建筑。经该抚委员查勘, 情形属实, 着照所请, 即依旧城基址建筑城垣, 以为厅治。^⑥

于是, 嘉庆十七年 (1812) 旧城兴建, 十八年竣工^⑦, 宁陕厅治再次迁回旧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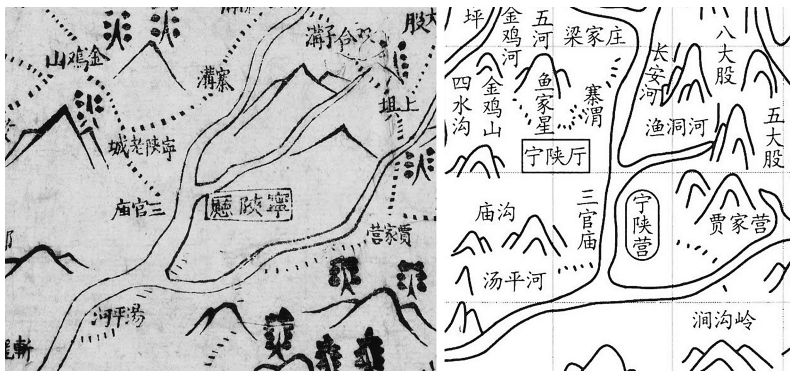


图2 《汉北图》(左)和《三省边防备览》(右)上的宁陕厅治所

作为此次宁陕迁城之议的查勘官员之一, 严如煜应当对宁陕新、旧城之别以及厅治迁移、迁回时间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反映在地图之上, 就是“宁陕厅”与其西侧“宁陕老城”的区分。此时宁陕厅位于老城东 15 里的关口新城 (即原宁陕镇城) 一带。后在道光初年《三省边防备览》一书的地图中, 严如煜将宁陕厅移回旧城, 体现出他对于治所地点的更新。由此, 以宁陕厅治所迁移判别“汉江南北图”的时间似乎不成问题。

① 参见《清仁宗实录》卷 173, 嘉庆十二年正月, 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本, 第 30 册, 第 265 页。
 ② 林一铭修, 胡官清、焦世官纂: 道光《宁陕厅志》卷 2《城郭》, “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 第 56 册, 第 68 页。此处“宁陕营”应为“宁陕镇”之误。
 ③ 叶世倬: 《新修宁陕厅城记》, 林一铭修, 胡官清、焦世官纂: 道光《宁陕厅志》卷 4《艺文》, “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 第 56 册, 第 93 页。
 ④ 参见叶世倬: 《退思堂遗集》卷 3《勘移宁陕厅城稟》, “清代诗文集汇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第 432 册, 第 177 页。
 ⑤ 参见叶世倬: 《退思堂遗集》卷 3《勘移宁陕厅城稟》, “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432 册, 第 177—179 页。
 ⑥ 《清仁宗实录》卷 255, 嘉庆十七年三月, 第 31 册, 第 446—447 页。
 ⑦ 参见叶世倬: 《新修宁陕厅城记》, 林一铭修, 胡官清、焦世官纂: 道光《宁陕厅志》卷 4《艺文》, “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 第 56 册, 第 93 页。

三 “汉江南北图”部分佐贰、营汛与其绘制时间

在《汉北图》下方有一段介绍地图基本情况的注记：

图为汉江以北，陕、甘、楚、豫四省边境。红线分疆界，所绘树木多寡，即为老林宽窄。大方圈为府，横方圈为厅，长方圈为州，圆圈为县，长圆圈为分驻佐贰、分防营汛。程途里数，另刊一册。如查某处，按册看图，可得其概。至河流沟岔，须举形势，亦无甚差讹也。^①

其中介绍了地图的政区图例，包括府、厅、州、县、佐贰营汛。阎俊烈摹绘的《汉南图》在图例上与其叙述相同。相对于府、厅、州、县这类正式政区，分驻佐贰、分防营汛这类县下的行政、军事机构数量更多。通过对其置废变迁的探究，理论上能够加深对于该图的认识，检验对于其绘制时间的判断。据上节，“汉江南北图”大致绘于嘉庆十三年至十八年。因此，以嘉庆十三年为时间断面，将图上以分驻佐贰、分防营汛符号表示的地名与实际的佐贰、营汛分防情况相对比，其比较情况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分驻佐贰、分防营汛对比表^②

序号	图上地名	实际存在的佐贰 (另加杂职、首领官)	实际存在的营汛	所属县级政区
1	青石关	青石关巡检	汉中镇左营南郑青石关外委	南郑县
2	马道驿	《三省边防备览》有马道驿巡检	汉中镇右营马道汛经制外委	褒城县
3	黄官岭	黄官岭巡检	汉中镇左营褒城黄官岭把总	褒城县
4	铜厂营			褒城县
5	铁炉川		汉中镇汉凤营铁炉川把总	凤县
6	三岔驿			凤县
7	废邱关		汉中镇留坝营废邱关外委	凤县
8	草凉驿	《三省边防备览》有草凉驿巡检	汉中镇汉凤营草凉驿千总	凤县

① 严如煜主持，郑炳然绘：《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② 佐贰官的存在情况参考成书于嘉庆十三年之后的各省、府、县志资料，巡检官亦同。并参考胡恒《清代巡检司地理》（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陈俊宇《清代四川巡检司时空分布补正——以方志和档案为中心》（《中国地方志》2021 年第 4 期）。营汛的存在情况较为复杂。汉中镇、陕安镇分别以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嘉庆十八年）、嘉庆《续修兴安府志》（嘉庆十七年）所载营汛为准，之后分别依据《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绿营变动记载进行逆推复原；湖北鄖阳府营汛情况则通过比对同治《鄖阳府治》，发现嘉庆《湖北通志》所记载的嘉庆七年的湖北鄖阳府营汛情况并未发生大的变动，以其为准；四川地区的营汛存在情况以嘉庆《四川通志》为准，由于其反映的是嘉庆十四年的营汛建置，将其中十四年记载的变动还原，反推嘉庆十三年 的建置情况。

(续表)

序号	图上地名	实际存在的佐贰 (另加杂职、首领官)	实际存在的营汛	所属县级政区
9	华阳	华阳县丞		洋县
10	大巴关	大巴关巡检		西乡县
11	五里坝	五里坝县丞		西乡县
12	司上汛		汉中市渔渡路营司上汛（嘉庆十四年，渔渡路营改为定远营）	西乡县
13	龙池汛			西乡县
14	瓦石坪		汉中市渔渡路营瓦石坪守备	定远厅
15	鱼渡坝	渔渡坝巡检	汉中市渔渡路营渔渡坝外委	定远厅
16	黎坝	黎坝巡检		定远厅
17	四亩地		汉中市宁陕营四亩地把总	宁陕厅
18	两河			宁陕厅
19	东江口	江口主簿	汉中市东江口营	宁陕厅
20	白神庙			宁陕厅
21	夹岭		汉中市东江口营夹岭汛外委	宁陕厅
22	洵阳坝		汉中市东江口营洵阳坝把总	宁陕厅
23	八仙河		陕安镇镇坪营八仙河汛	安康县
24	砖坪	砖坪县丞	陕安镇砖坪营	安康县
25	镇坪营	镇坪巡检	陕安镇镇坪营	平利县
26	七里关		陕安镇七里关营	洵阳县
27	二州垭			紫阳县
28	茅镇关	毛坝关主簿		紫阳县
29	斑鸠关		陕安镇紫阳营斑鸠关汛	紫阳县
30	上津关	郧阳府分防通判	郧阳镇郧阳城守营千总、把总、外委千把总	郧西县
31	丰溪营		郧阳镇竹山协协标中军、左营把总	竹溪县
32	向家坝		郧阳镇右营千总、外委千把总、外委、额外外委	竹溪县
33	官渡营	官渡堡巡检	郧阳镇竹山协协标右营守备、额外外委	竹山县
34	保丰汛		郧阳镇竹山协协标中军、左营把总	竹山县

(续表)

序号	图上地名	实际存在的佐贰 (另加杂职、首领官)	实际存在的营汛	所属县级政区
35	界山汛		鄖阳镇竹山协协标右营把总	竹山县
36	红坪汛		鄖阳镇竹山协协标右营千总、额外外委	竹山县
37	九道梁	九道梁巡检	鄖阳镇镇标左营千总、额外外委	房县
38	冷盘垭		鄖阳镇镇标左营千总	房县
39	上龛营		鄖阳镇镇标左营守备、把总	房县
40	大昌		川北镇大昌营（嘉庆十四年改为巫山营大昌汛）	巫山县
41	徐家坝		重庆镇盐厂营徐家坝汛	大宁县
42	大宁厂		重庆镇夔州协盐厂营	大宁县
43	城口营	太平厅经历	川北镇太平协左营（嘉庆十四年，改属绥定协，为城口营）	太平厅
44	大竹河		川北镇太平协大竹河汛	太平厅
45	竹溪关		川北镇太平协右营（嘉庆十四年改太平营竹峪关汛）	太平厅
46	镇龙关	巴州州判	川北镇通巴营巴州汛	巴州
47	江口镇	江口镇巡检		巴州
48	毛浴镇		川北镇通巴营	通江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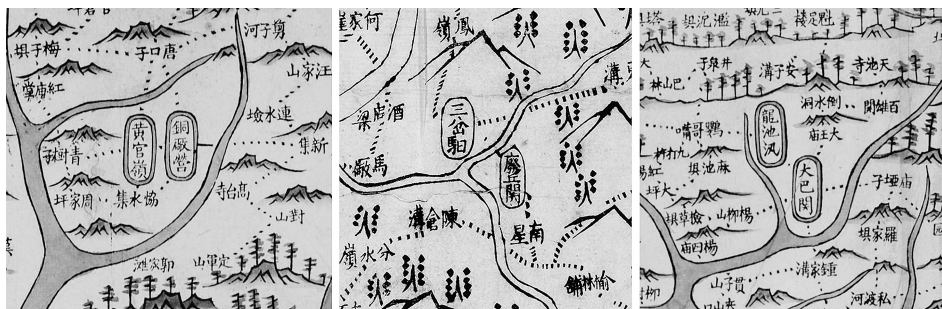
清代州县佐贰官主要指州的州同、州判，县的县丞、主簿。^①但也有巡检驻地而得到特殊符号表示的，如西乡大巴关巡检。因此，在上表中将分防的杂职、首领官也一并统计。在营汛方面，驻于府厅州县城池之外的营在图上基本皆有表示，但数量众多的分防汛地仅有部分表示，呈现出一定的选择性。

按注记中“长圆圈为分驻佐贰、分防营汛”的叙述，两者只需其一就会有长圆圈符号表示。据上表，图上地名的实际分驻存在4种情况^②：第一，佐贰、营汛两者皆驻；第二，仅有佐贰驻扎，而无营汛；第三，仅有营汛驻扎，而无佐贰；第四，佐贰、营汛两者皆未驻扎。其中前3种符合注记描述，符号表示应无问题。但第四种情况与叙述不符，本不应当以特殊符号表示。而这种情况又可分为无任何佐杂、营汛驻扎以及仅有巡检驻扎两种，鉴于其特殊性，以下分述之：

① 参见嘉庆《大清会典》卷4《吏部》，香港文海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115—116页。

② 此处的佐贰不包括其他杂职官，如巡检、经历。

(一) 全无佐杂、营汛驻扎



铜厂营

三岔驿

龙池汛



两河

白神庙

二州埡

图3 全无佐杂、营汛驻扎的6个地名

1. 铜厂营

“铜厂营”应为“钢厂营”，可能是一处营汛，但嘉庆十三年绿营体系中并无钢厂营建制存在。梳理史料，可发现钢厂一地，在嘉庆七年（1802）至嘉庆十一年存在过守备营。《清实录》载：

（嘉庆七年七月）南郑属之钢厂添设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一员，外委二员，兵三百名，作为钢厂营。其附近之褒城、马道、青石关，即于该营内酌拨弁兵分汛，均归汉中协专辖。^①

至嘉庆十一年十二月裁撤，

定陕西宁陕各镇营善后事宜……改驻黄官岭之提署钢厂营守备为汉中协右营守备，驻汉中府城。移钢厂之把总，驻黄官岭，归汉中协管辖。^②

方志之中亦有印证。其置废与嘉庆初年川陕楚三省的白莲教起义密切相关。

① 《清仁宗实录》卷100，嘉庆七年七月上，第29册，第346页。

② 《清仁宗实录》卷172，嘉庆十一年十二月，第30册，第255—256页。

又黄官岭、西南钢厂、土地岭、西流河通宁羌、广元，军兴时曾设卡于宁羌之张家山、板仓坝，以御川贼，并于钢厂设守备镇之，事平裁撤。^①

钢厂营守备改为汉中协右营守备，原先驻钢厂之把总，也改驻黄官岭，钢厂营至此不再有营汛存在。

2. 三岔驿

嘉庆十三年时并无佐贰、营汛驻扎。三岔驿为连云栈道上的重要驿站，有驿丞驻扎。而在嘉庆年间驿丞署移驻驿南废邱关（尚无法确定在嘉庆十三年前后）。^② 光绪年间或以驿丞兼巡检事。光绪《凤县志》载：“三岔驿驿丞兼巡检事。”^③《清实录》中虽未明言，但其记述：“凤县三岔驿驿丞张开樾，捕务废弛，玩视公事。”^④ 捕务乃巡检分内之事，以捕务废弛督责驿丞，或是驿丞兼巡检事的缘故。另光绪年间编绘的《陕西全省舆地图》也记有“三岔兼巡检事”^⑤，可作旁证。

3. 龙池汛

龙池汛应为西乡县西南190里的龙池场，但笔者未见史料中有佐贰、营汛驻扎的记载。白莲教起义之时，因其为“各山径总汇”的军事要地，清廷于此“设卡防堵”^⑥。或在嘉庆元年（1796）至嘉庆九年之间为有把总、千总等绿营将弁驻扎的汛地。

4. 两河

未见史料中有两河一地的记载。

5. 白神庙

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一书记其有都司营驻扎，“三十里，白神庙，改设都司营驻此，十里，东江口，长安县主簿驻此”^⑦，“（东江口营）南十里白神庙，设都司一员，隶汉中镇”^⑧。此都司营当为嘉庆十三年所改设之东江口都司营。然而其他文献中仅模糊地记载东江口都司营驻扎东江口。道光《宁陕厅志》中有一幅《东江口营图》，东江口营城与江口主簿署隔洵河而望。^⑨ 在《三省边防备览》的地图中东江口亦与江口营隔洵河相望，且两者皆绘有特殊的长圆圈符号。^⑩ 因此，颇疑此处的江口营即《汉北图》上的白神庙，只不过《汉北图》将其相对位置绘错了。东江口都司营可能确实驻于白神庙。无论如何，以严如煜的认识来看，东江口都司营驻白神庙，长安主簿驻东江口，两者皆可标绘长圆圈符号。

① 光朝魁纂修：道光《褒城县志》卷1《疆域图考》，“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262号，第17页。

② 参见朱子春等纂修：光绪《凤县志》卷1《地理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281号，第93页。

③ 朱子春等纂修：光绪《凤县志》卷5《官师志》，第228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176，光绪九年十二月下，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4册，第460页。

⑤ 魏光焘等辑：《陕西全省舆地图》，“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第287号，1969年。

⑥ 张廷槐纂修：道光《西乡县志》卷1《关隘》，“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45册，第573页。

⑦ 严如煜纂修，张鹏翮补修，郭鹏点校：《三省边防备览点校》卷2《道路考上》，第62页。

⑧ 严如煜纂修，张鹏翮补修，郭鹏点校：《三省边防备览点校》卷7《险要上》，第189页。

⑨ 参见林一铭修，胡官清、焦世官纂：道光《宁陕厅志》卷首《宁陕营图》，“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56册，第48页。

⑩ 参见严如煜纂修，张鹏翮补修，郭鹏点校：《三省边防备览点校》卷1《舆图》，第46—47页。

6. 二州埡

嘉庆十三年时二州埡并无佐贰、营汛驻扎，但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至嘉庆七年，曾为紫阳县主簿所驻之地。乾隆四十七年，陕西巡抚毕沅上奏，“又兴安所属紫阳县西南之二州埡，距县一百八十里，于川省太平县连界……应于二州埡添设主簿一员”^①，此事于当年九月批准。但在嘉庆二年，其署“被贼焚毁”^②。嘉庆七年，紫阳县主簿移驻毛坝关。^③ 二州埡至此不再有佐杂驻扎。

（二）仅有巡检驻扎



大巴关

黎坝

江口镇

图4 仅有巡检驻扎的3个地名

1. 大巴关

大巴关巡检司亦可称大巴山巡检司。胡恒《清代巡检司地理》（以下简称胡文）称西乡县属大巴山巡司自雍正末设立起就一直延续到清末。^④但在道光《西乡县志》中，有“（大巴关）设有巡检分防，今移驻峡口”^⑤、“大巴司巡检署在大巴山麓，今移建峡口”^⑥的记载。《陕西全省輿地图》亦同。^⑦《三省边防备览》地图也以长圆图标示峡口而不是大巴关。^⑧但嘉庆《汉南续修郡志》无载。嘉庆后期大巴关巡检可能移驻峡口，但名称未变。

2. 黎坝

如胡文所述，嘉庆七年（1802），清廷于西乡县南添设简池坝巡检。嘉庆十年，又将简池坝巡检移驻黎坝。^⑨但《汉南续修郡志》言黎坝有巡检防守且每岁分防简池坝数月。^⑩但这种巡检

① 毕沅：《兴安升府疏》，严如煜纂修，张鹏勋补修，郭鹏点校：《三省边防备览点校》卷17《艺文下》，第377—379页。

② 杨家驹修，陈振纪纂：民国《紫阳县志》卷2《建置志》，民国14年（1925）石印本。方志对于二州埡主簿设立及迁移的时间记载均在实录、奏疏等资料的后一年，即乾隆四十八年（1783）和嘉庆八年。在此以实录、奏疏资料为准。

③ 参见《清仁宗实录》卷100，嘉庆七年七月上，第29册，第344页。

④ 参见胡恒：《清代巡检司地理》，第93—94页。

⑤ 张廷槐纂修：道光《西乡县志》卷1《关隘》，第573页。

⑥ 张廷槐纂修：道光《西乡县志》卷2《公署》，第582页。

⑦ 参见魏光焘编：《陕西全省輿地图》，第103—104页。

⑧ 参见严如煜纂修，张鹏勋补修，郭鹏点校：《三省边防备览点校》卷1《輿图》，第10—11、26—27页。

⑨ 参见胡恒：《清代巡检司地理》，第93—94页。

⑩ 参见严如煜主修，郭鹏校勘：《（嘉庆）汉中府志校勘》卷3《关隘》，第102页。

分防两地的非常情况可能持续不久,《三省边防备览》载:“简池坝,定远厅巡检移驻在此”^①;“简池坝,山势陡峻,下临深涧,当川边之冲要,颇有市集,黎坝巡检寄治于此。”^②道光初年黎坝巡检已经寄治于简池坝。由于中央并未下达明确变更驻地的命令,故而在名称上仍沿用黎坝巡检。光绪《定远厅志》^③、《陕西全省輿地图》^④亦有佐证。因位于简池坝的巡检署建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⑤,具体寄治时间应在此之前。

3. 江口镇

陈俊宇考证巴州江口镇巡检设于乾隆二十年(1755),道光三年(1823)移太平黄钟堡^⑥,可从。

除图上标注特殊符号的佐贰、营汛驻地之外,东乡南坝场主簿却未标识。南坝场主簿的置废与东乡县治所迁移密切相关。东乡县旧城因嘉庆元年为“教匪所焚”而于次年移驻大成寨。^⑦嘉庆七年,因县治僻处西隅,太平城口场主簿移驻南坝场。^⑧嘉庆十八年东乡县移回原治之后,南坝场与县治相距仅90里,已难称鸾远,遂于次年将南坝场主簿移驻大成寨。^⑨由上述南坝场主簿移驻过程可看出,在嘉庆二年至嘉庆七年,东乡县城已移驻大成寨,此时尚无南坝场主簿,此时符合“汉江南北图”上的情况。



图5 南坝场与东乡县城

从“汉江南北图”上的营汛、佐贰情况来看,大部分都能够佐证其绘制于嘉庆十三年至十八年之间,但亦存在少部分与其向抵牾的。其中就有钢厂营(嘉庆七年至十一年)、龙池汛(嘉

① 严如煜纂修,张鹏勋补修,郭鹏点校:《三省边防备览点校》卷2《道路考上》,第61页。

② 严如煜纂修,张鹏勋补修,郭鹏点校:《三省边防备览点校》卷7《险要上》,第177页。

③ 参见余修凤等纂修:光绪《定远厅志》卷6《建置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270号,第292页;余修凤等纂修:光绪《定远厅志》卷1《地理志》,第145页。

④ 参见魏光焘编:《陕西全省輿地图》,第88—90页。

⑤ 参见余修凤等纂修:光绪《定远厅志》卷6《建置志》,第292页。

⑥ 参见陈俊宇:《清代四川巡检司时空分布补正——以方志和档案为中心》,《中国地方志》2021年第4期。

⑦ 参见徐陈漠纂修:嘉庆《东乡县志》卷6《城池》,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

⑧ 参见徐陈漠纂修:嘉庆《东乡县志》卷3《建置》,嘉庆二十年刻本。

⑨ 参见徐陈漠纂修:嘉庆《东乡县志》卷3《建置》,嘉庆二十年刻本。

庆元年至九年)、二州埡主簿(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七年)、南坝场主簿(嘉庆二年至七年)。此外,嘉庆十三年时,另存在4处巡检驻地而未见图的情况,即留坝厅南星、郧县黄龙镇、房县板桥山、达县麻柳场。鉴于图中存在仅有巡检驻扎却绘有符号的情况,以上4处也可以认为是与地图绘制时间不相符合的情况。

四 “汉江南北图”绘制时间的矛盾及原因

对于汉江南北图的绘制时间,如果仅探及府、厅、州、县等正式政区的层面,自然就可“确凿无疑”地定于嘉庆十三年至十八年。但若将关注对象的层级下移,探究地图上的佐贰、营汛地名,则又可发现一些与其不相符合的情况,这就产生了关于地图绘制时间的矛盾。但在某种程度上,宁陕厅治迁移过程中,严如煜出策出力,应当对其有较为明晰的认识,加之图上大多数佐贰、营汛皆能提供佐证,嘉庆十三年至十八年仍然是“汉江南北图”绘制时间的“正解”。至于其他矛盾之处可归为地图上的“错谬”。“错谬”的产生主要有两种原因:第一,客观上地图绘制资料存在问题;第二,主观上地图绘制者的有意之举。^①

以上两因皆涉及“汉江南北图”的绘制过程。然而,史籍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却付之阙如。目前仅能从图注“楚南严如煜谨识、蜀北郑炳然谨绘”判断其具体绘制者乃郑炳然。郑炳然曾为严如煜绘制《汉南续修郡志》中的地图:

余友广安郑君炳然,秀才从军,驱驰边徼十数年,山川向背,道路险夷,不啻画沙聚米。余凡老林抚绥暨督修堰渠,郑君必策马偕。又精绘事,工远势,能具千里于尺幅。南郑孝廉杨生筠,富文学,志洁行芳,其风徽盖慕乡先贤李司徒父子者,乃以绘山川、疆域、栈道、水利各图,采访、考订、校阅之事属之二君。^②

西蜀郑君炳然从军数年,煜行部至各边城,罔不偕焉。山川向背,道路险夷,知之最悉。因相属绘分图、栈道、华阳、黑河各图,而系之以《说》,庶后之览者,瞭如指掌云。^③

从中可以认识到《汉南续修郡志》中的地图至少有3类绘图资料:第一,“从军驰驱边徼十数年”,对三省交界地区积累了大量的实地考察资料;第二,“采访”则以征询的方式,汇集了当时当地人的经验性认识;第三,“考订、校阅”则反映出对于文献资料的搜集与利用。严如煜早先在《苗防备览》一书的地图绘制过程中,也使用了上述3类资料。“询之于土著土民,征之于熟苗土蛮,稽之以行军档案,参之以旧志新图。”^④严如煜在平定“苗乱”过程中的亲历亲行^⑤,实地考察资料也应在地图绘制中起到一定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在绘制“汉江南北图”时,严如煜、郑炳然应当也使用了上述3类绘图资料。第一类实地考察资料,可以从严如煜的仕宦经历推知一二。嘉庆十三年之前,严如煜先后任洵阳知县(嘉庆六年至八年,1801—1803)、定远厅同知(嘉庆八年至十年)、潼关厅同知

① 这种“错谬”也可能是绘图者的误画。但一方面,这种可能性很难验证;另一方面,目前所见可能“误画”的情况有8处,而图上仅有48处分驻佐贰、分防营汛符号,出现频率过高。因此,暂且不考虑这种情况。

② 严如煜:《叙》,严如煜主修,郭鹏校勘:《(嘉庆)汉中府志校勘》,第1—2页。

③ 严如煜主修,郭鹏校勘:《(嘉庆)汉中府志校勘》卷1《舆图》,第5页。

④ 严如煜:《苗防备览》卷1《舆图》,严如煜撰,黄守红标点,朱树人校订:《严如煜集》,第414页。

⑤ 参见《清史稿》卷361《严如煜传》,第11391页。

(嘉庆十三年)。^① 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的序言中^②, 严如煜自述:

庚申岁(嘉庆五年), 余奉檄从军, 往来秦陇金商梁洋之间。后承乏洵阳、定远。洵邻郧阳, 定连川北, 每因团练搜捕至边, 得与川楚父老相问劳。^③

相对而言, 陕南、甘肃东南是严如煜较为熟悉的地域, 有着大量实地经验的积累。其中“得与川楚父老相问劳”或有关第二类资料的获得。至于第三类资料, 由于“汉江南北图”的绘制应在嘉庆十三年之后, 时已任职汉中知府的严如煜在上任之后就有修志之意^④, 《汉南续修郡志》的编纂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应为严如煜、郑炳然在绘图时所采用。由上观之, 严如煜对汉中府一地的地理资料掌握最为尽全, 并不应该出现钢厂营、龙池汛、留坝厅南星这类错误。客观资料的限制应当不是“错谬”出现的主要原因。

若如此, 则更可能是严如煜的有意之举。那么“错谬”的说法应当予以摒弃, 更应当以绘者的视角理解地图。上述钢厂营、龙池汛、二州埡、南坝场佐贰、营汛驻地的兴废皆与嘉庆初年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相关。嘉庆五年, 严如煜以孝廉方正科赴廷试, 上“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策”, 嘉庆帝亲擢第一。^⑤ 后又派往陕南, 为平定白莲教起义尽心尽力, “不三载, 贼次第平, 君亦履以军功由洵阳令、定远厅同知, 擢汉中府知府, 至陕安兵备道。”^⑥ 严如煜仕宦生涯的起步与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紧密相关。此外, 严如煜还积极总结经验教训, 加之三省地区的地理资料, 汇集成多部专著, 用来昭示后人, “汉江南北图”应该就是其中之一。“汉江南北图”与平定白莲教起义的经验总结应该存在较强的联系。白莲教起义或是影响严如煜、郑炳然绘制图上特殊符号地名的因素之一。

“汉江南北图”上承载白莲教起义的历史记忆, 加之其他诸种因素, 使地图虽以描绘嘉庆十三年至十八年的面貌为主, 但依然存在其他时间的地理信息。以今人对于现代地图的认识来看, 地图对于地理信息的表现具有“现时性”与“共时性”两大特征。一幅合格的现代地图, 其上绘制的一定是反映绘制时间时最新的地理信息。即使是历史地图, 亦一定展示的是某一时间断面的地理信息。对于严如煜“汉江南北图”绘制时间的判断, 明显不能使用今之地图视角, 否则要么凭借个别的地理信息而判读出图上存在的某一时间段, 以之为地图绘制时间, 要么迷惑于图上混杂的时间段, 而无从对其绘制时间做出判断。

“汉江南北图”上不同时间地理信息的错杂, 正是孙靖国所言“中国传统舆图所承载地理信息的复杂性”^⑦。这种复杂性的产生, 一方面缘于客观上时人地理认知的限制, 或绘图资料的

① 参见李汉林:《严如煜年谱简编》,《民族论坛》2014年第9期。

② 据辛德勇研究, 此书大致成于嘉庆十年到十二年之间[参见辛德勇:《〈三省山内道路考〉的发现及其价值》, 沈乃文主编:《版本目录学研究》(第5辑), 第201页]。

③ 转引自辛德勇:《〈三省山内道路考〉的发现及其价值》, 沈乃文主编:《版本目录学研究》(第5辑), 第200页。

④ 参见严如煜:《叙》, 严如煜主修, 郭鹏校勘:《(嘉庆)汉中府志校勘》, 第2页。

⑤ 参见《清史稿》卷361《严如煜传》, 第11391页。

⑥ 魏源:《陕西按察使赠布政使严公神道碑铭》, 严如煜纂修, 张鹏补修, 郭鹏点校:《三省边防备览点校》, 第629页。

⑦ 孙靖国:《〈江防海防图〉再释——兼论中国传统舆图所承载地理信息的复杂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错误;① 另一方面,是主观上的有意采择,来自于与当今地图不同的绘制传统。就中国传统地图而论,成一农已经揭示出地图上时间相互矛盾的地理要素状况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在某些情况下会以某幅地图为基础根据现实需要进行部分改绘,但又没有通过文字注记进行说明”②。文中所举地图以及孙靖国研究的《江防海防图》都是其反映。“汉江南北图”揭示出的是私人绘制地图中表示时间的不统一状况。以“经世致用”著称的严如煜在地图编绘时必然相当注重地图的务实性。在他眼里,地图上不同的时间表示似乎并不会影响地图的实用性。相对而言,“汉江南北图”中三省交界地区的政区、交通、地形、植被等要素皆清晰可辨,其形势大局之描绘较为成功。因此,结合成一农、孙靖国所举地图以及“汉江南北图”,有理由认为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传统中未必包含当今地图对于地理信息表现的“现时性”“共时性”特征。

结 语

通过对“汉江南北图”中央部分特殊符号地名地理信息的考证与梳理,可以发现,虽然图上的县级治所迁移信息可以判断该图大致绘于嘉庆十三年至十八年,但若将视角下移到县下的佐贰、营汛驻地,则存在一些与之相矛盾的时间表达,钢厂营、龙池汛、二州埡主簿、南坝场主簿以及其他未标明的巡检驻地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对于这种矛盾,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以今人的视角将其归之为“错谬”,而应当以绘者的视角重新审视。进而认识到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传统中未必包含当今地图对于地理信息表现的“现时性”“共时性”特征。中国古代地图中可能会出现不同时代的信息共存于一图的情况。因此,正如成一农所说,对中国古代地图表示时间的判定要极为小心,不能以现代地图的要求考订传统地图所表示的时间,否则难免陷入各种矛盾之中。③

此外,值得反思的是,中国古代地图的分类也在无形之中对其绘制时间的判别产生了影响。当今的各种古旧地图目录中,其分类更多采取的是现代的分类标准,由此便不可避免地以今人之视角观察古旧地图。严如煜的“汉江南北图”在各目录中往往被归类于“跨区连省普通地图”④“区域地图(单幅省图或连省合图)”⑤“地方行政区图”⑥,明显属于政区图的层面。然而政区图本身也是现代地图学的概念,隐含着对“现时性”“共时性”的要求。“汉江南北图”能反映的不仅是三省交界地区的政区情况,植被覆盖的自然地理情况也有所反映。其绘制意图和中国古代大多数被归类于“政区图”的地图一样,皆是为了反映地区或全国形势以作各种实际功用。相比而言,以“形势图”为类别之名能更好地反映此类地图的特征,并能促使研究者以传统视角看待中国古代地图,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地图表现时间的不一以及古地图承载地理信息的复杂性。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参见丁雁南:《地图学史视角下的古地图错讹问题》,《安徽史学》2018年第3期。

② 成一农:《浅谈中国传统舆图绘制年代的判定以及伪本的鉴别》,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文津学志》(第5辑),第106页。

③ 参见成一农:《浅谈中国传统舆图绘制年代的判定以及伪本的鉴别》,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文津学志》(第5辑),第111页。

④ 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第59页。

⑤ 李孝聪编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第50页。

⑥ 林天人编撰,张敏译:《皇舆搜览——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清舆图》,第106页。